

清史纂修

《满文老档》刍议^{*}

吴元丰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之久。有清一代，满文的地位十分显赫，称“清字”，定为“国书”，因而在清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满文档案，虽屡遭厄运，历经沧桑，但保存至今的，仍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其中形成时间较早、备受中外学界关注的，当属《满文老档》。

一、《满文老档》名称之诠释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齐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或汉文记事或交往，已不适应女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齐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仿照蒙古文创制。初创时期的满文，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故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都有所不便。故于“老满文”使用33年后，即后金天聪六年（1632）初，努尔哈齐的继承者皇太极颁布命令，由达海承担完成了改进“老满文”的任务。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因有圈点，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清入关前形成的以老满文和新旧过渡时期满文缮写并在乾隆年间重抄的旧档册，一般称为《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这一名称，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泛指《满文老档》原本和抄本，而从狭义上讲，是专指《满文老档》抄本，或有时也专指原本。

《满文老档》原本的名称，因无题名，导致多样性，无论在清代，还是在近世，皆不一致。在清朝官修《康熙起居注》、《大清高宗实录》及其公文档案内，称之为《无圈点档子》^①、《无圈点档案》^②、《无圈点档》^③、《无圈点老档》^④、《旧满洲档册》^⑤等，有时还简称《老档》^⑥。乾隆中期以后，即相对规范，称之为《无圈点老档》。而近世对《满文老档》原本的称谓，主要有三种，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满文原档》。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满文老档》原本时，冠以《旧满洲档》之名；1970年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汉译出版《满文老档》原本时，冠以《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之名；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重新影印出版《满文老档》原本时，冠以《满文原档》之名。

至于《满文老档》抄本的名称，与原本称谓情况有所不同，相对比较一致。抄本按其抄写文字，可分为两种，一为老满文“照写本”，书衣书名满文《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一为新满文“音写本”，书衣书名满文《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由于这两种抄本各有固定的满文题名，所以其满文名称自始至终不存在分歧，均照原题名称之。然而，其汉文名称，则因翻译方面的问题，出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北京100031

现了不一致。从清代抄本底本上原贴汉文函签及其有关汉文档案记载来看,其汉译名称都比较统一,照写本《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译成《无圈点老档》,音写本《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译成《加圈点老档》^⑦。在清代除使用规范的汉译名称外,有时又统称《老档》^⑧。二十世纪初,深藏清宫的《满文老档》抄本面世后,国内外学者开始撰文介绍,发表研究文章,翻译出版。在这过程中,或许没有看到或忽略了清代比较规范的汉译名称,因而除启用《满文老档》名称外,还开始使用新的汉译名称,《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译为《无圈点字档》,《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译为《加圈点字档》或《有圈点字档》。

近世之称谓与清代汉译的《满文老档》抄本名称,相差不大,只差一字。从翻译角度来讲,近世的翻译属“直译”性质,而清代的翻译属“意译”性质。比较而言,清代汉译的抄本名称,即《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更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专指性,况且此名称,在清代公文档案中使用较为广泛,可视为当时官方认同之名称。

二、《满文老档》抄本之形成

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将《满文老档》原本由盛京运到北京,保存在紫禁城内的内阁大库,凡遇修史或查核八旗佐领源流等事宜,均提调查阅。

乾隆六年(1741),距新满文替代老满文业已109年,当时能够阅览和看懂《满文老档》原本者已寥寥无几。乾隆帝对此深感不安,唯恐长此以往人们会遗忘满洲文字的来源,或者说忘掉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为了防止出现无人辨识老满文的局面,乾隆帝颁谕曰:“无圈点字原系满洲文字之本,今若不编书一部贮藏,则日后湮没,人皆不知满洲之文字,肇始于无圈点字也。著交付鄂尔泰、徐元梦,阅览《无圈点老档》原本,依照十二字头,编书一部;并于宗学、觉罗学及国子监诸学,各抄录一部收贮。”^⑨大学士鄂尔泰、加尚书衔太子少保徐元梦遂遵照上谕,查阅内阁库存的

《无圈点老档》原本,“除读之即可认识字外,其与今字不同难认之字,悉行检出,兼注今字(即指新满文),依照十二字头,编成一部书。”^⑩此书命名为《无圈点字书》,共4册,实际上是一部老满文和新满文相互对照,并按满文十二字头顺序编排的辞书。同时,鄂尔泰、徐元梦在翻阅《满文老档》原本的过程中发现,“此项档册,历年久远,颇为糟旧。”^⑪遂经奏准,将《满文老档》原本逐页托裱,重新装订后,仍收存于内阁大库。

在事过33年后,为了彻底解决《满文老档》原本永久性保存和经常性利用的问题,乾隆帝又决定重抄《满文老档》原本,并令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和阿桂承办有关抄写事宜。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底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底,由舒赫德、于敏中、阿桂主持完成了《无圈点老档》原本的重抄工作,用时整整5年。除用老满文照写《无圈点老档》(即《无圈点字档》)2部外,还用新满文音写《加圈点老档》(即《加圈点字档》)3部。北京紫禁城内内阁大库和盛京皇宫内崇谟阁存放《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各1部,北京紫禁城内上书房存放《加圈点老档》1部。另外,在重抄过程中形成的《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底本各1部,经装帧后,也保存于内阁大库。

《满文老档》原本是清太祖、太宗时期形成的记注政务之档册,大部分采用编年体例,少部分采用纪事本末体例。太祖朝、太宗朝各20册,共计40册,其中37册于乾隆年间重抄成《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此重抄成的《无圈点老档》、《加圈点老档》及其底本,俱以时间为序编排,按一定的厚度分册(本)分函(套)装订,每部26函180册,其中太祖朝10函81册,函册序号均统一编写;太宗朝16函99册,因太宗有天聪、崇德两个年号,故其函册序号的编设与太祖朝不同,太宗朝函的序号是统一的,册的序号则不然,是按天聪、崇德年号分成两个部分,而后于每个部分内再分编各自统一的序号,太宗天聪朝10函61册、太宗崇德朝6函38册。在函册衣上,各贴书名签和副签。书名签上分别用新老满文书写《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和《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汉译为《加圈点老档》和《无圈点老档》。在副签上，分别用新老满文书写函次、册次及其起止时间。如太祖朝《加圈点老档》第二函副签，新满文为“jai dohton taidzu hūwangdi i abkai fulingga i sucungga aniya aniya biya ci abkai fulingga i duici aniya jorgon biyade isinahabi”，汉译“第二函自太祖天命元年正月至天命四年十二月”；该函第七册副签，新满文为“nadaci debtelin abkai fulingga i ilaci aniya sunja biyaci jorgon biyade isinahabi”，汉译“第七册天命三年五月至十二月”。

这次《满文老档》原本的重抄工作，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抄，而是具有一定的整理和抢救性质。无论是《无圈点老档》，还是《加圈点老档》，在其抄录和转写过程中，对档案内出现的地名、人名、时间、官职以及文字，都进行了必要的考证，按统一体例编排，分编函册装订，冠以规范名称，进行必要的注释，并分抄数部，异地分存。在某种意义上讲，《无圈点字书》的编写和《满文老档》原本的重抄工作，开了《满文老档》整理和研究的先河，对满文历史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1911年清朝灭亡后，随着时局的变化，《满文老档》原本及其抄本、底本的存放处所，也不时发生变化。至20世纪50年代后，其存放处所已较固定，《满文老档》原本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阁藏本及其底本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崇谟阁藏本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唯上书房藏本迄今下落不明。

三、《满文老档》诸本之特征

《满文老档》的原本、抄本及其底本，从版本学角度分析，各具特色。

现存40册《满文老档》原本，其中37册，曾在乾隆年间整理托裱，按朝年排列，编写千字文序号，抄写成《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剩余3册，1934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被发现，未经托裱和编写千字文序号，因其字体及记事体裁与37册大致相同，所以归入《满文老档》原本

序列，补编满附一、满附二、满附三序号^⑫。

《满文老档》原本的纸张，为高丽笺纸和明朝官署旧公文纸两种。凡用旧公文纸者，均有明朝官署记注的汉字，有的还加盖朱色官印。在太祖朝20册内，用高丽笺纸者8册、旧公文纸者9册、高丽笺纸和旧公文纸兼用者3册，而太宗朝20册皆用高丽笺纸。文本极不统一，纵最长61.4厘米、最短36.6厘米，横最长47.8厘米、最短22.7厘米，厚最厚13.3厘米、最薄0.3厘米。书写用的文字多样化，除满文外，还有少量的蒙古文和汉文，汉文较蒙古文更少，而且是满汉合璧。就满文而言，也同样是多样化，其绝大部分用老满文，少部分用新老过渡期满文或新满文。其书写的字体，多用行书，楷书和草书次之，又有两处为老满文雕版印刷体，其中一处有版框。此外，还有大量的删减、添加、涂改之处。

乾隆年间的《满文老档》抄本，除依抄写文字分为“照写本”和“音写本”外，还按其原存放处所可分为“内阁藏本”、“上书房藏本”和“崇谟阁藏本”。从抄写的时间来看，内阁藏本最早，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一月至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抄成；上书房藏本次之，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至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抄成；崇谟阁藏本最晚，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至四十四年（1779）底抄成。除下落不明的上书房藏本外，内阁藏本与崇谟阁藏本比较，在版本特征方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相同之处是：线装包角，白口，四周双边朱丝栏，单鱼尾，无行格，半叶7行，书页为白鹿纸，册衣为黄绫，楷书，每段落起始处有朱色○符号，凡原档残缺之处均贴黄纸签，上书汉文“原档残缺”。不同之处是：内阁藏本的开本稍大，页面纵39.4厘米、横23.5厘米，半叶版框纵28.5厘米、横18.3厘米，而崇谟阁藏本的开本略小，页面纵33.7厘米、横19.8厘米，半叶版框纵24.1厘米、横16.2厘米；内阁藏本的书眉上贴有黄纸签注，而崇谟阁藏本则无。又经将内阁藏本《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比较，除相同点外，还有一些差异，主要是签注不同，《无圈点老档》在应注释的文字左侧及书眉相应处分别贴有空白黄

纸条，而《加圈点老档》除在应注释的文字左侧贴黄纸条外，还在书眉相应处粘贴写有注释文字的黄纸签。

《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的底本，也称稿本或草本。内阁藏本《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的底本与正本比较，在版本特征方面差异较大，其页面纵 30.2 厘米、横 22.5 厘米，无版框，每页 7 行，书页为台连纸，册衣为黄榜纸，行书。另外，无论在《无圈点老档》底本上，还是在《加圈点老档》底本上，都有诸多编辑抄写方面的符号和文字。符号有：墨色○符号，标示抬一格；墨色○○符号，标示抬二格；墨色○○○符号，标示抬三格；朱色○符号，标示另起一行；朱圈墨书㊟符号，标示空一行；朱圈墨书○符号，标示第一页末端文字，等等。在每册扉页上，一般都有编辑抄写人员的名字和画押。如在《加圈点老档》底本天命朝第十五册第一扉页上，用汉字书写“画一侍读麟喜（画押）、复校云南道监察御史明喜（画押）、查对人地名笔帖式临保（画押）、校对翻译官魏廷弼（画押）、加圈点中书隆兴（画押）”；在其第二扉页上，用汉字书写“大总裁大学士舒”^⑬。除此之外，还在扉页上贴一些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如《无圈点老档》底本天命朝第三十六册贴有两张纸条，上书汉字分别为“天命三十六本，第五套，共十九页，三天”；“初一日，发有○○（即指有圈点）十九页，限五天少一页，无○○（即指无圈点）九页，限三天多一页。今日所交无○○甚草，请写恭致些”。^⑭

另外，从内容上来看，无论是《满文老档》原本与乾隆抄本，还是不同抄本（包括底本）之间，都存在一些差异。首先《满文老档》原本与乾隆抄本比较，乾隆抄本内不包括后来发现的满附一无朝年档、满附二天聪六年档、满附三天聪九年档 3 册；既是作为蓝本抄录的原档 37 册内，还有一些整段整句的内容被删或遗漏而未抄写；另在抄本内某些词句经修改后抄写或抄错，而且原本内蒙古文部分都译写成满文。其次，不同抄本之间比较，有些词的写法，在相同位置，因版本不同而不同。如“han”、“be”、“de”，或无圈点，

或有圈点^⑮；汉文“左”、“狗”，满文写成“hashū”或“hasho”、“indahūn”或“yendahūn”^⑯；助词“de”（于、在、“i”（之、的），与前面之词，或连写，或分写；^⑰还有个别词，或抄错，或漏抄。然而，从整体上看，《满文老档》的原本及其抄本，在内容方面彼此间差别不大，至于抄本与底本，差异更小。

四、《满文老档》诸本出版之回顾

乾隆年间，《满文老档》原本重抄事毕，其原本、底本及抄本，仍深藏宫禁，密不对外，鲜为人知。这种情况，直至 120 余年后才发生了变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7 月，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势力范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结束。当时作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正好在东北，有机会对沈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古迹和历史文献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内藤湖南发现了在沈阳故宫崇谟阁存放的乾隆年间重抄《加圈点老档》。1906 年 6 月，在《早稻田文学》（6 月之卷）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奉天宫殿看到的图书》一文，简单介绍了《加圈点老档》。1912 年初，内藤湖南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身份再次来到沈阳，当时清朝已经灭亡，经过多方努力，与同一大学讲师羽田亨一起，将全套 180 册《加圈点老档》都拍照带回日本，并在《艺文》杂志上发表《清朝开国期之史料》一文，除《加圈点老档》外，还介绍了《无圈点老档》。次年，将拍照的《加圈点老档》，经洗印后，分册装订数部。现存放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洋文库等处。

1916 年左右，清末进士金梁任奉天地方官员，有机会接触到崇谟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和《无圈点老档》，聘用懂满汉文者 10 余人着手翻译《加圈点老档》。经过两年多时间，于 1918 年译成。1929 年，挑选很少一部分译稿，冠以《满洲老档秘录》之名，自刊铅印，上下两册。1933 年，将《满洲老档秘录》稍加增减，合并为一册，冠以《满洲秘

档》之名，重印出版。自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间，又将部分译稿冠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之名，连载于《故宫周刊》第245期至459期。

在内藤湖南拍照崇谟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带到日本后，不少日本学者先后用日文翻译出版。1920年至1935年间，东京大学教授藤冈胜二利用照片复制本进行翻译工作。1939年，其日译文手写稿，经小仓进平等编成太祖、太宗天聪、太宗崇德三卷本，冠以《满文老档》之名，由岩波书店影印出版。此译作是首部比较完整的日文译本。稍晚些时候，鸳渊一、户田茂喜也开始利用照片复制本进行翻译，1937年，将其太祖朝日文译稿刊载于《史学研究》第9卷第1号。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日本东京成立“满文老档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神田信夫、冈本敬二、岛田襄平、本田实信、松村润、冈田英弘、石桥秀雄等，开始对照复制本进行罗马字母转写及翻译注释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完成全部翻译注释工作。自1955年至1963年间，其译稿冠以《满文老档译注》之名，由东洋文库出版，共7册，采用原文罗马字母转写、日文对译及意译方式编辑，在第3册和第7册之后，分别附太祖朝的《注》、《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汉满对照表》、《正误表》和太宗朝的《注》、《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汉满对照表》。此译作是最完整、最具权威和影响的崇谟阁藏本日译本。另外，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三田村泰助也根据照相复制本翻译过太祖朝部分内容。

崇谟阁藏本《加圈点老档》的汉译本，除上述金梁译本外，还有一种汉译本。1974年至1977年间，辽宁大学李林教授利用1959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教授罗马字母转写的崇谟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参考金梁汉译本、满文老档研究会日译本，翻译了太祖朝部分。1978年9月至1979年5月，其译稿冠以《重译满文老档》，分订3册，由辽宁大学历史系相继刊印。

至于内阁所藏《满文老档》的原本及其抄本的发现，要晚于崇谟阁藏本。1911年清朝灭亡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逊清皇室条件，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暂留住故宫，《满文老档》的原本及其抄本仍存于内阁大库，不被人们所了解。1914年由赵尔巽任馆长的清史馆开馆后，1917年内藤湖南教授应邀到设在故宫东华门内的清史馆参观时，曾见过内阁大库所存《满文老档》原本。后来他在1929年出版的《读史丛录》论文集中所收《清朝开国期之史料》附记内记载“看到过《满文老档》的原档，还保存在那里。但是到了近年清史馆的史料常常散佚，出售物中能经常看到，其原档迄今是否保存在那里，我犹觉不安。”^⑧1924年溥仪退出故宫，1925年10月成立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设图书和文献二部，分别保管图书和档案。1931年初文献馆工作人员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37册原本及其抄本，继而1935年又发现乾隆年间未曾重抄的3册档案。于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制定《整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之缘起与计划》，组织人员开始整理，计划编撰《满文无圈点字典补编》、《满文老档总目》、《满文老档细目》、《满文老档原本与抄本校勘表》，以及挑选其中重要的史料翻译，编成《选译满文老档》出版。在这一计划的筹划及启动过程中，因时局动荡，1933年《满文老档》原本随故宫博物院贵重文物南运到上海，1935年自上海运回北平整理，1936年2月再次南运到上海，当年底由上海转运到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运往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所制定的《满文老档》原本整理研究计划，也因此未能实施。

仅就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满文老档》原本来说，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所有40册《满文老档》原本，经整理编辑，分订10册，冠以《旧满洲档》之名，影印出版。1970年3月和1971年9月，台湾广禄、李学智二先生挑选《满文老档》原本内荒字号、昺字号两册档案，经汉译出版。该汉译本，命名为《清太祖老满文原档》，分订两册，采用原文罗马字母转写与汉文对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编辑体例，虽非《满文老档》原本的全译本，然系首部以罗马字母转写与汉文译文合集方式出版的译本，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后不久，台

北故宫博物院张葳等挑选《旧满洲档》第6册和第7册,开始罗马字母转写及翻译。张葳译注,广苏美林、魏美月校订,陈捷先审阅。其译稿冠以《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之名,分订两册,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另外,在《旧满洲档》出版后,日本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位先生挑选其中第7册(乾隆年间未曾重抄的三册之一,即满附三),进行罗马字母转写和翻译,冠以《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之名,分上下两册,于1972年和1975年,由东洋文库刊印。自1979年始,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三位先生根据日本东洋文库刊印《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的罗马字母转写进行汉译,其译稿冠以《天聪九年档》之名,198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满洲档》出版40周年后,即2005年10月,为弥补《旧满洲档》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现的“失真”问题,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冯明珠研究员主编,将所有40册《满文老档》原本经整理编排,逐册拍照,仿真制版,采用A3版面印刷,分订10册,重新出版。此次出版,印刷精致,装帧典雅,每册各附所录原档的彩色照片及页面尺寸,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档案原貌,堪称精品。

在内阁藏本《无圈点老档》和《加圈点老档》发现后,1936年1月至1937年7月间,日本户田茂喜先生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利用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采用满文日文对音体例,以钢笔抄写。该抄本,页面纵20.9厘米、横16.7厘米,共42册,今保存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⑨。1938年,日本京都大学今西春秋先生又利用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开始进行罗马字母转写及日文翻译工作。自1944年11月至1944年12月间,其罗马字母转写及译文,连载于《书香》杂志第15卷第11号至16卷第5号。今西春秋先生的这一译作,仅包括太祖朝全部81册中的第1至15册,是一部未完之作。1978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作,成立了《满文老档》译注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任世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远廉二位先生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其成员有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孝廉、张凤良、郭美兰、刘建新、罗丽达,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富丽,中央民族大学季永海、赵展等先生。经过译注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历时12年完成译稿,冠以《满文老档》之名,分编上下两册,用手抄稿直接影印方式,于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译作是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的第一部完整之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五、《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出版之意义

自1905年发现崇谟阁所藏《加圈点老档》以来,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百余年来,中外不少满文学者对《满文老档》原本及其抄本,以孜孜不倦的态度,锲而不舍,坚持整理和翻译,不拘形式,出版公布,以供学术研究之用。其态度和精神,极为可贵。同时也说明了两点,一是《满文老档》原本及其抄本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二是编译出版《满文老档》原本及其抄本具有相当难度。

从目前编译出版的情况来看,《满文老档》的原本,先后两次影印出版,有部分汉文译文或日文译文,而无完整的汉文译文或日文译文;崇谟阁所藏抄本《加圈点老档》,其原文经罗马字母转写后全部出版,并有完整的日文译文和太祖朝汉文译文,而无完整的汉文译文;内阁所藏抄本《加圈点老档》,仅有完整的汉文译文和部分日文译文,而其原文未曾出版公布。可以讲,在抄本中形成时间最早并有签注的内阁藏本,无论是用影印形式,还是用罗马字母转写形式,迄今为止没有出版过其满文原文。这不仅是长期以来《满文老档》整理研究方面的缺憾,也是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领域的遗憾之一。

早在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作成立的《满文老档》译注组翻译内阁所藏《加圈点老档》时,原计划采用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和汉文译文合集方式出版,后因诸多原因,只出版汉文译文,未能实现原先的设想。自1990年3月出版《满文老档》至今,已过去整整20年,时事变迁,无论是出版理念,还是出版条件,各

个方面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具备出版一部比较理想之作的条件。

此次编译出版的版本，选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年间重抄并藏于内阁的《加圈点老档》，共计 26 函 180 册。采用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及汉文译文合集的编辑体

例，在保持原分编函册的特点和联系的前提下，按一定厚度重新分册，以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汉文译文为序排列，合编成 20 册，其中第 1 至第 16 册为满文原文、第 17 和第 18 册为罗马字母转写、第 19 和第 20 册为汉文译文。具体分编情况列表如下：

新编册次	庙号	年号	原档函册/罗马字母转写/汉文译文
第 1 册	太祖		第一函第一册至第四册 第二函第五册至第十三册
第 2 册	太祖	天命	第三函第十四册至第二十二册
第 3 册	太祖	天命	第四函第二十三册至第三十一册
第 4 册	太祖	天命	第五函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二册
第 5 册	太祖	天命	第六函第四十三册至第五十册 第七函第五十一册至第五十九册
第 6 册	太祖	天命	第八函第六十册至第六十六册 第九函第六十七册至第七十二册
第 7 册	太祖	天命	第十函第七十三册至第八十一册
第 8 册	太宗	天聪	第一函第一册至第八册 第二函第九册至第十五册
第 9 册	太宗	天聪	第三函第十六册至第二十册 第四函第二十一册至第二十七册
第 10 册	太宗	天聪	第五函第二十八册至第三十三册 第六函第三十四册至第三十九册
第 11 册	太宗	天聪	第七函第四十册至第四十四册 第八函第四十五册至第五十册
第 12 册	太宗	天聪	第九函第五十一册至第五十六册 第十函第五十七册至第六十一册
第 13 册	太宗	崇德	第十一函第一册至第六册 第十二函第七册至第十二册
第 14 册	太宗	崇德	第十三函第十三册至第十八册 第十四函第十九册至第二十五册
第 15 册	太宗	崇德	第十五函第二十六册至第三十二册
第 16 册	太宗	崇德	第十六函第三十三册至第三十八册
第 17 册	太祖		罗马字母转写
第 18 册	太宗		罗马字母转写
第 19 册	太祖		汉文译文
第 20 册	太宗		汉文译文

为了“存真”起见，满文原文部分，逐页扫描，仿真制版，按原本之颜色，以红黄黑三色套印，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版本特征，唯因印书开本需求，稍微压缩原版本尺寸，文内所贴“原档残缺”黄签底色改印灰色。罗马字母的转写，完全依从满文原本。汉文译文，选用《满文老档》译注组译文，并翻译未曾翻译的一部分签注。据统计，内阁所藏《加圈点老档》签注共有 410 条，其中太祖朝 236 条、太宗朝 174 条。当年《满文老档》译注组只选译太祖朝 96 条，其余太祖朝 140 条、太宗朝 174 条，共计 314 条都没有翻译，此次逐条全部翻译出版。凡当年《满文老档》译注组考证调整的几处译文，均照满文原文还位，以保持原貌。

另外，为了查阅方便，编制《太祖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祖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祖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和《太宗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分别附于各该朝罗马字母转写和汉文译文之后。

在编译出版过程中，自然会遇到如何取书名的问题。经过再三思考，最终取汉文名为《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满文名为《dorgi yamun asaraha manju hergen i fe dangse》。其主要出发点是：一为体现此次选用版本的度藏处所，即内阁大库；二为考虑此次选用汉文译文先前出版所取之名，即《满文老档》；三为考虑到清代公文档案中比较专门使用之名，即

老档》；四为体现书写之文字，即满文。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是乾隆年间根据清入关前形成的老满文档册重抄而成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 [1636]），记载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化、习俗、天文、地理以及与周边邻近国家、部族的交往关系等方面事宜。其内容极少见于其他史籍，是清代官修《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大清太祖实录》、《大清太宗实录》、《大清太祖圣训》、《大清太宗圣训》和《皇清开国方略》等史籍的基础资料，加之这些官修史书限于其编撰目的、体裁、篇幅等诸多因素，必然对资料进行筛选，甚至进行粉饰或

修改。《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虽不是最原始的档案，但与清代官修史籍相比，也属第一手资料，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作为乾隆年间《满文老档》诸抄本内首部内府精写本，而且有其他抄本所没有的签注，具有十分独特的古籍版本价值。《内阁藏本满文老档》首次以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和汉文译文合集方式出版，必将对清开国史、民族史、东北地方史、满学、八旗制度、满文古籍版本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比较原始的、系统的、基础的第一手资料，其次也有助于准确解读用老满文书写的《满文老档》原本，以及深入系统地研究满文的创制与改革、满语的发展变化。

*本文系《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一书序言修改而成，该书于2010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①清内阁实录馆档案，见李光涛、李学智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2集，1973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38本。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1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庄亲王允禄满文奏折，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1辑，第778页，1980年版。

④⑥《清高宗实录》，第976卷，第27页。

⑤《清高宗实录》，第996卷，第16页。

⑦大学士阿桂、于敏中奏稿，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史馆·人事”，第742卷。

⑧盛京将军福康安汉文奏折，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04-01-4-375-3。

⑨⑩⑪内阁大学士鄂尔泰等满文奏折，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见鄂尔泰、徐元梦编：《无圈点字书》，卷首，乾隆六年内府精写本。

⑫冯明珠：《多少龙兴事，尽藏原档中——院藏〈满文原档〉的命名、整理与出版经过》，载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满文原档》，第10册，附录，第49页，2005年。

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加圈点老档》底本，02-

20-04-081-02。

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加圈点老档》底本，02-20-04-083-05。

⑮在《无圈点老档》底本第12函第9册第2页“han”无圈，而其正本第12函第9册第2页“han”有圈；《无圈点老档》底本第12函第11册第10页“be”有点，而其正本第12函第11册第9页“be”无点；《无圈点老档》底本第12函第11册第9页“de”有点，而其正本第12函第11册第8页“de”无点。

⑯“左”字，在《无圈点老档》底本第12函第9册第6页写作“hashū”，而其正本第12函第9册第6页写作“hasho”；“狗”字，在《加圈点老档》底本第11函第1册第4页写作“indahūn”，而其正本第11函第1册第5页写作“yendahūn”。

⑰《加圈点老档》底本第11函第1册第20页，“be”与前面之词不连写，即 uba be，而其正本第11函第1册第23页，“be”与前面之词连写，即 ubabe；《无圈点老档》底本第1函第3册第10页，“i”与前面之词不连写，即 solkoi，而其正本第1函第3册第11页，“i”与前面之词连写，即 solkoi。

⑱[日]内藤湖南：《读史丛录》，第117-146页，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1929年版。

⑲吴元丰主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第22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